

主编 孙熙国 李翔海

北大中国文化研究

第1辑

文化选择与文化发展：杜维明、张世英、黄枏森先生中西马高端对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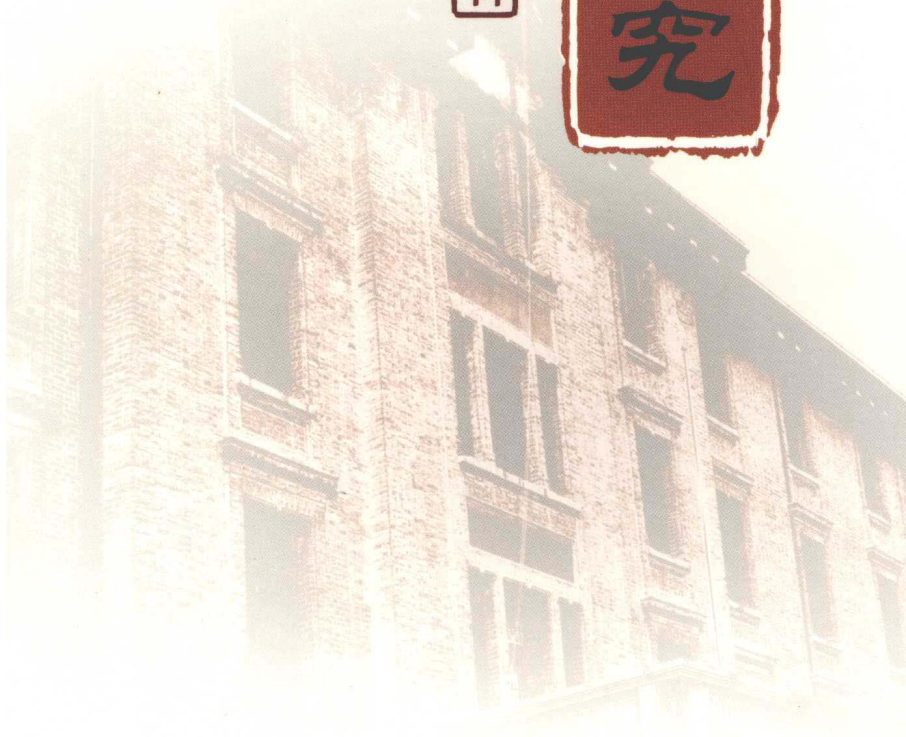
『德』的哲学抽象历程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孙熙国 肖雁）

我的儒学观（郭齐勇）

中国现代直觉论与生命哲学（胡军）

殷海光的终极关怀、文明反思与『人』的理念（王中江）

中国文化当代发展的哲学省思（成中英）



中国文化研究

第1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大中国文化研究. 第1辑/孙熙国, 李翔海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097-3069-0

I. ①北… II. ①孙… ②李… III. ①中华文化-文集 IV. ①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81012 号

北大中国文化研究 (第1辑)

主 编 / 孙熙国 李翔海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刘 丹 范明礼 于卢杰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李艳涛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0.75

版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字 数 / 353 千字

印 次 /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069-0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发刊词

在学界朋友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北大中国文化研究》终于面世了。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文化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但是，什么是文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化？怎样建设和发展我们的文化？在这些涉及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根本问题上时贤并未达成共识。张岱年先生提出“综合创新”的文化建设理论，一直为学界所瞩目。但是，究竟如何实现综合创新？又成为困扰我们的问题。这一问题解决不了，文化创新就难以落到实处。

通常人们把文化理解为自然的人化，也就是说，凡是超越了人的本能从而有意识地作用于物质世界的一切活动都属于文化的范围，这就把物质生产及其成果和精神生产及其成果都划归到了文化的范围。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广义文化。与此相对应的狭义文化，则是指人们的精神生产活动及其成果。

我们主张狭义的文化观，因为文化的本质是思想。思想对象化在不同的载体中，就有了文化的不同的存在形式，如体现在器物中的文化、体现在行为中的文化、体现在民俗中的文化等。一些文化学著作把文化的类型划分为器物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实不妥。因为器物、行为、民俗等本身并不是文化，他们仅仅是文化的载体。我们之所以把它们叫做文化，不是因为它们所具有的物质形式，而是因为在这些物质形式的背后所承载着的思想的内容。这些思想内容才是文化之为文化的关键。故宫、天坛、未名湖、博雅塔等，人们之所以把它们叫做文化，绝不在于它们所具有的物质外壳，而在于物质外壳背后所负载的思想内容。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文化的本质是思想。文化是相对于经济和政治来说的。

一切认识都来源于实践，时代实践是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真正动力和源泉。“问题是时代的格言。”“任何哲学只不过是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在这一意义上说，哲学是时代问题的形上解答，文化则是时代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一个时代的文化，必须要回答和关注这个时代的问题，完成这个时代的任务，否则就不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如果我们把中国传统文化原封不动地照搬过来，这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文化，而是古代中国的文化；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这也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文化，而是西方社会的文化；如果我们把文本层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原封不动地搬过来，这还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文化，而是产生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时代的文化。所以，在今天我们特别强调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

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不可能单纯地依赖于某一种文化形式，而是在新的实践下实现各种不同文化形式的互斥互补，交融碰撞，综合创新。不同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创立的不同文化形式，有对立和冲突的一面，也有融合、互补和统一的一面。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创立的各种优秀的文化传统，就如同人的耳目鼻口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不能“蔽于一隅”，而应该站在“道术”的高度予以审视。各种不同的优秀文化传统虽“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但毕竟是“不该（赅）不偏（遍）”，仅“得一察焉”（庄子语）。或如荀子所说：“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执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此数具者，皆道之一隅也。”但“一隅”之术不足以举人类文化之“全道”。

因此，立足中国实际，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需要我们摒弃任何狭隘的成见，公正客观地对待人类在其历史进程中创造的各种不同的优秀文化，正确认识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真正实现中国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三者之间的对话与融通。这是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路径，也是当代理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使命。为了完成这一时代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

2011年10月1日

目 录

CONTENTS



发刊词 / 1

特 别 策 划

文化选择与文化发展：杜维明、张世英、黄枏森先生
中西马高端对话 / 3

中国哲学探源

“德”的哲学抽象历程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 孙熙国 肖 雁 / 33

儒家哲学面面观

我的儒学观 郭齐勇 / 55
儒家“仁爱”思想论纲 吴根友 / 72
生活儒学关键词语之诠释与翻译 黄玉顺 / 98
朱子理气关系的三种不同解读 丁为祥 / 111
中国传统文化与生死智慧 郑晓江 / 135

出土文献与中国哲学研究的新进境

从简帛文献看孔子后学的思想取向 李景林 / 151
近年来出土的简帛文献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杨庆中 / 170

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

- | | |
|-----------------------|-----------|
| 中国现代直觉论与生命哲学 | 胡 军 / 189 |
| 殷海光的终极关怀、文明反思与“人”的理念 | 王中江 / 208 |
| 论中国现代的文化观 | 柴文华 / 236 |
| 科学认知范式的形成及其检讨 | |
| ——以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理解方法为中心的讨论 | 李承贵 / 257 |
| 从“延安经验”看中国模式的探索 | 于春松 / 271 |

域 外 飞 鸿

- | | |
|-------------------|-----------|
| 中国文化当代发展的哲学省思 | 成中英 / 279 |
| 论《太平广记》中雷神传说的若干方面 | 姜明琪 / 304 |

特别策划

北大中国文化研究
(第1辑)



文化选择与文化发展：杜维明、 张世英、黄枏森先生中西马高端对话*

2011年1月10日

主持人：杨河教授（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副书记、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理事长）

主讲人：杜维明先生、张世英先生、黄枏森先生

主办：北京大学中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地点：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

摘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选择和文化发展是涉及文化自觉、文化自省和文化自强的重要问题。文化选择和文化发展要尊重历史、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是一个开放性的话题。文化选择的主体是我们自己，即中华民族。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各自具有相对独立的来源、志趣和视野。同时每一方又不足以单方面提供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唯一资源和最终答案。而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又不能离开任何一方，对世界重大问题的回答也不能离开任何一方。这就要求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共同在场，都要自己超越自己，包容对方，采纳对方，在此基础上构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开放的、和而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新形态。

关键词：文化选择 文化发展 中国文化 西方文化 马克思主义 和而不同

作者简介：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教授、院长；张世英，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黄枏森，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100871）。

* 本文由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杨哈旭整理。经作者同意刊载于此。

杨 河：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发展，文化的多元化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凸显。多元文化意味着各种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冲突和碰撞。而人类发展的共同利益又要求不同文化之间应该从事对话和融合，这也是文化本身的发展规律。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文化多元化对所有的国家和民族既是机遇也是挑战。文化作为历史文明的积淀是思考整个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一直在引领着社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对人类的发展有更深层次更高境界的追求。相对于经济政治的变革和发展，文化的变革和发展更具有重要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在世界变化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在向现代社会转型。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们已经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这个空前的社会变革为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巨大的革命，也必然会带来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最终会转化为文化问题，为文化的发展提出这样或那样的要求。文化的变革和发展必然会提出文化选择的问题，这是一个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当代评价的问题。实际上这样的评价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就在担当民族复兴的使命。在清王朝的没落中，他们深刻地反思传统文化；在不可遏制的西学东渐中，他们学习和诠释西方文化。20 世纪初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的格局和方向，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选择。在辛亥革命推翻了近三百年的清王朝统治以后，应运而生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将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大格局和大方向初步确定下来了，这就是认识和处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关系。而后的发展实际上是沿着两个路径在进行：一个是政治实践的路径，一个是学术界的路径。在政治实践的路径上，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成功地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在学术研究路径上，从清末“中体西用”的讨论开始，存在了一百多年中西文化之争，或者叫中西文化之辩。今天马克思主义需要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西方文化需要进一步被认识和借鉴；中国文化需要进一步适应中国现代化转型。中国未来新文化的建设可能在相当程度上还要依赖于它们之间的并存、对话和交流中获得发展，这就是现实。这个现实是历史铸就的。我们是被抛在一个既定的世界之中，被嵌入一个既定文化传统之中。我们不能够脱离这个文化现实来谈文化选择与文化发展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主题的副标题叫做“中西马对话”。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历史教训后，我们逐渐



懂得了用历史的态度、客观的态度和辩证的态度来认识和处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关系的重要性。但是我想懂这个道理和运用这个道理来分析问题、说明问题并不是一回事。我们需要学习和提起，今天我们为此要请教三位先生。下面我们按着“中西马”的顺序，首先请杜维明先生给我们讲话。

杜维明：我非常希望听到两位长辈的发言。其实我不应该首先发言。我觉得非常荣幸，因为在1985年，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有幸教了一门价值学的课。那时候黄枬森教授是系主任。所以我特意拜访过他而且也在代课过程中有机会向他请教，所以感到非常荣幸。另外，对张世英教授慕名已久。在十多年以前，台湾的钱穆先生，在晚年口授了一篇很短的文字，就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这篇很短的文章大概不到两千字，当时在台湾的学术界没有引起什么反响。有人说这是天人合一的老问题，后来他的夫人就把他的这段文字记录下来。他说：我讲天人合一，以前讲过，但现在再重新讲是彻悟了，自己觉悟了。这段文字在台湾没有引起很大的影响，在大陆先是季羨林先生很感动，就做出了非常好的回应。在回应过程中大陆有好几位教授也做了回应，但最使我感动的就是张世英教授的回应。张先生在回应里面不仅提到天人合一的关系，而且提到了知行合一的问题，也提到了情境交融问题，提到了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些最精华的东西。所以我非常荣幸向两位前辈请教。

冯契先生曾经提到一个观点，是说“五四”以来，中华民族所碰到的大的问题是古今中西之争。所以从中西之争入手，比如说传统和现代，如何了解西方文化，向西方文化学习。陈序经提出全盘西化，胡适之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后来胡适发现他的观点太极端了，应该是充分地现代化。如何现代化，从五四运动开始成为大家所关注的热点。这个过程进行了相当长的时段。其实从鸦片战争讲，1839年到新中国成立，每年有很大的变化，每十年有很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到改革开放，变化更为剧烈，整个变化就是如何从西方学到富强的法宝，使中国从东亚病夫乃至天朝上国怎样能够改变，一些学者认为，“五四”以来不论是极端的革命思想还是极端的保守思想，大家都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当时还说了救亡图存，是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除了中西之争之外，这些人也提到古今之争。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之间可能有新的对话的空间。“五四”时代当时有很多重要的思想传到中国。有自由主义思

想，有实证主义思想，有经验主义思想，像罗素，有伯格森所代表的生命哲学，有达尔文的天演论，还有很多的思想。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倒反而不是很突出。只是到了1920年代、1930年代，马克思的思想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俄国革命以后，也就是1917年，列宁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方，代表的是西方文化发展的高峰，强烈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自由主义。中华民族从五四运动以来，有非常强烈地向西方学习，对西方认同，同时有强烈的反传统意识，主要的原因，像鲁迅、巴金、陈独秀、胡适之有强烈的反传统、反儒家，也就是说在强烈的爱国主义，也就是民族主义之下，认为传统文化或者儒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乃至后来把儒家的传统“糟粕的糟粕”和西方“精华的精华”相比较。在这个氛围之下，一方面是强烈的反传统，向西方学习，另外是强烈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自由主义。列宁所代表的精神是西方所发展的高峰，同时又强烈地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对中国学术界、知识界有非常大的吸引力。正因为当时有很多重要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思想家，认为如果不把封建糟粕彻底消除，中国要发展起来是非常困难的。我为什么一直说我是五四启蒙精神的承继者也是受惠者，我们没有完成对传统文化所造成的阴暗面彻底的批判。当时对儒家的阴暗面是用放大镜来看的。虽然如此，终于把传统的阴暗面突出了，什么三纲是权威主义、男权主义、专制主义等等。正因为有这段很重要的历史，认同儒家的少部分学者也能够获得很多的资源，重新对儒家传统进行反思，进行重新的了解、批判和认识。我认为当时最为激进的思想家，他们的贡献是毫无疑问的。这些人可能过于乐观，认为通过批判，中国传统的糟粕就能彻底地消除，可以在新的时代、新的平台向西方学习了。困难在哪里？文化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我们不能把它看成一个静态的结构而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动态的过程。在动态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必须有向前推进的认同，如果认同扩散，要对外面的环境进行适应有很大的困难。认同太强了可能会变成封闭的观念，现在看到的原教旨主义，它是封闭的而且对外是侵略性的。但对于开放的文化，开放就是尽量适应外界压力，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的核心价值，你自己文化的主体性基本被边缘化了，变得一无所得。在这个氛围之下，要真正能够向西方学习，向马克思学习，包括启蒙思想，我们还算比较熟悉。

我经常提这些观念，如果你对自己的文化没有亲和感，你对自己的文化的主体性彻底放弃，希望能够从西方找出先进的思想，我们认为我成为今天



的我一无是处，但是我相信我一定能够站起来。这个站起来靠什么？就靠我对西方的学习所带来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就会造成极端的情况：去掉中，完全要西；去掉古，完全要今。以今天的西方作为我们的传统，把糟粕的糟粕看成我们传统的真实情况，比如说阿 Q、祥林嫂、孔乙己这种人物真正地代表了中华民族。所以说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一无是处，要向西方学习，本来是好的策略。如果我们还在抓住传统古今，我们向西方学习的力度是不够的，一定要矫枉过正，就是全盘向西方学习。传统是在心灵中栖息的。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宇宙观，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我们对自我的理解，都与传统有关系。我们心灵中栖息的传统不去发扬的话，不去理解它，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必须消除的对象，那么真正的价值被排除了，它的阴暗面反而是依然存在。

我认为必须要致力于四个问题，而这四个问题是有机联系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传统的阴暗面进行激烈的批判，而这些批判要持之以恒，要全面要深入。二是使我们的传统文化成为我们数千年发展的精髓或者核心价值。所以我说，我们反对三纲，但不能简单理解。还有很多重要的思想，如“五常”，仁爱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同情与慈悲；义就是公正、公平；礼就是人与人沟通的最基本的文明礼貌；智慧；还有信实、诚信。这些不就是儒家价值，不就是亚洲价值，而是扎根在儒家，扎根在亚洲，包括韩国和日本，越南以及世界各地华人社区能够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价值。这些价值不是亚洲价值，而是扎根于亚洲的普世价值。这些价值与自由、人权是可以进行长期对话的。西方的精华，比如说人权，这个观念是西方发展出来的核心价值，任何人、任何一种文化都应该以人权为普世价值。同时同情、责任、社会和谐，这也是普世价值。美国、西欧虽然也有这些价值，但不突出，所以你要注重自由，你就不能不注重正义；注重理性，你就不能不注重同情和慈悲。你如果特别注重人权，就不要忘了责任。如果你太注重法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互相尊重、文明礼貌必须注重。你如果突出了西方核心价值就不要忘记伊斯兰的、中国的核心价值。面向人类当前的实际，这些价值必须要得到尊重，如果你只走启蒙的价值，而启蒙的价值，我刚刚提到，不是现在的普世价值，但启蒙运动从 17 世纪到 18 世纪到 19 世纪工业革命，市民社会的出现、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是最大的、最重要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但是启蒙运动大的发展一直到现在，像现代化也有它的缺失。它最大的缺失：第一，对自然，不去了解去认识，讲

知识是力量，造成人和自然之间的紧张；再一个对精神世界，对人类文明的超越向往，因为它是反对精神反对基督教，正因为如此，它是凡俗的运动，有其局限性。是男性主义，是强烈的对外侵略主义，真正的纯粹的欧洲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使启蒙的价值扩大，如果扩大应该把东方的或者中国的、儒家的、道家的、佛教的、伊斯兰的还有拉丁美洲的乃至非洲的有些价值发扬光大，造成对21世纪的人类文明理解。所以今天有这么一个难得的机会，能够向张世英教授所体现的西方的精神和黄枏森教授所体现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请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谢谢！

黄枏森：我想今天我应该先声明一下，好像刚才说我是代表马克思主义来讲，我这个代表不了，也没有人让我代表。所以我不过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谈谈我个人的看法，关于中西文化关系的看法。咱们喜欢谈中西马，其实你说文化，可以是讲西方文化、中国文化，但讲马克思主义文化，这恐怕就不合适了。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一种文化因素，但它没有构成一种文化形态，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可以说是文化形态。也可以讲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但不能讲马克思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文化因素。谈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大，我谈不好。我谈谈中西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也包含在中西文化的关系里面，也包括中西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所以我想还是谈谈这个问题，我主要谈三点：一、中西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二、中西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科学性和实践性；三、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

其一，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由于西方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的成熟阶段，阶级斗争日益激烈，无产阶级需要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但是无产阶级及其思想代表不可能凭空创造一种哲学，哲学的思想资料还得从过去的思想中寻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主要的思想根源只能是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西欧近代哲学，也就是德国理性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因此从思想渊源的关系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哲学的后代，而西方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辈。至于说到中国哲学，很难说中国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思想来源之一，我记得有同志做过这方面的文章，但是这个文章做不好，不成功。原因就是很难明确论证中国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来源之一。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的发展，中国哲学是它的思想来源之一。所以我觉得说得笼统一点，中国哲



学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来源之一。就这种意义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中国哲学的后辈，而中国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辈。这种传承的关系绝不限于创立、传播与发展。那么就是现在，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创新也是非常宝贵的，也是它的思想来源之一，它也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料，为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提供养料。我们举个很明显的例子，譬如价值论，价值论作为哲学的一个重要部门，过去是被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排斥的，否定的。而今天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哲学部门之一。这个价值论就是直接从西方哲学嫁接过来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所主持的一个科研项目，叫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有四本成果，其中有一本叫做《中西哲学的当代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这本书的主编，西方哲学部分是赵敦华教授，中国哲学部分是孙熙国教授。我们这个项目的考虑仍是出于这种理解。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

其二，我想谈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西哲学在根本上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差别。过去我们经常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是哲学史的革命变革。那么革命变革表现在哪里呢？我们谈得最多的是实践，是实践性。过去哲学是脱离实践的，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指导实践，是来自实践，是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的。这个是一个根本的区别。近年来还有一个根本的区别为大家所忽视，就是它的科学性。所谓科学性确切一点讲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科学，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有科学的因素，其他哲学就没有科学的因素，不能这么说。一般地讲，所有的哲学只要是讲道理的都有科学因素。但是从整体来讲，没有一门哲学可以叫做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科学。而且科学性和实践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面是互相依存、互相依赖的。有实践性才有科学性，有科学性才有实践性。实践必须以科学的观点、科学的原理来指导。如果以非科学的反科学的原理来指导自己的实践，这种实践是一定要失败的。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主要的就是这两个特征。当然我们还可以讲其他特征，譬如说阶级性、批判性等等。但是这些特征都可以从这两个特征引申出来。这不是我的观点，这是个传统的观点，是个老观点。我们过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时经常这么讲。但是近年来，大家往往回避科学问题，回避科学性。老实说对这个问题我感觉到困惑，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门科学，不能是一门科学？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必须重提，而且必须明确地加以阐明。在我看来不但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史联系起来，而且要把哲学史与科学史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弄清

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科学史告诉我们任何一门学科从非科学成为一门科学都是一次飞跃。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实现的革命变革，就是这种从非科学变为科学的一次飞跃。我愿意强调，不能脱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而只谈它的实践性，“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对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有人把“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归结为辩证唯物主义，这是毫无根据的。事实恰恰相反，那些错误正是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结果。“左”倾教条主义把革命实践歪曲成打倒一切，把主观能动性夸大成为精神万能，把一切矛盾都看成是敌我矛盾，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错误，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能离开科学性来谈实践性，这是我想谈的第二点。

其三，我想谈谈辩证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问题。过去，当然今天也是，我们讲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有人说这个只是课堂哲学，不是论坛哲学，事实上确实有这个倾向。在论坛哲学当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可以说是摇摇欲坠，而且特别是否定辩证唯物主义。所以对这个问题我还想谈几点看法。第一点我想谈一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过去的说法是马克思是辩证唯物主义，20世纪30年代，这个说法已经差不多被否定了。因为事实上当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系统理论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更没有这个称呼。那么这个就成为马克思没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铁证。但是我认为还是应该肯定地回答，马克思有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马克思是个辩证唯物主义者。我有几个理由：第一，马克思当时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是十分明确的，是他自己讲的；第二，这个唯物主义是什么唯物主义？是不是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当然不是，那还是什么唯物主义，它只可能是辩证唯物主义。那么我这样讲是不是仅仅是一种推测？因为它不是别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我认为不完全是推测。应该还是一种归纳，为什么这么讲？一个就是它是一直肯定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当然它否定黑格尔辩证法的体系，但是他一直肯定黑格尔的辩证方法。那么这种方法都是思维方法，或者叫思维形式，思维方式。思维方式就是哲学基本原理的运用。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一直是肯定的。再一个就是他对唯物史观的，唯物史观里面包含着辩证的分析，他肯定了人类社会内部辩证的矛盾运动，他分析了这个矛盾运动，这就是辩证法，当然这是历史辩证法。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里也明确讲，他的方法是辩证方法，他的方法是唯物主义的。所以我认为马克思有辩证唯